

中国工资薪金所得税税负感知状况 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以签订正规劳动合同的雇员为例*

李文

内容提要:本文使用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对签订正规劳动合同雇员的工薪所得税税负感知状况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税负无知和税负高估、低估等感知税负偏差现象广泛存在,其根本成因在于,对税负的准确认知会使现实中的有限理性个体付出巨大的认知成本,因而个体在评估成本收益后,可能会摒弃理性判断而选择基于直觉的非理性判断,从而导致认知偏差。个人收入、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三险一金”缴存比例、自认对财经信息的关注,以及与自感幸福、公共服务满意度、公共服务公平意识等相关的主观感受状况等均会对工薪所得税感知税负偏差构成显著影响,而各影响因素的效应在不同收入水平和不同性别组别之间存在差异。在制定税收政策时,决策者应将纳税人对税负的感知状况纳入考虑范围,以避免政策的实际效应偏离预期效应,并更好地实现相应的政策目标。

关键词:个人所得税 税负感知 有限理性 启发式

作者简介:李文,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山东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250100。

中图分类号:F81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102(2025)05-0057-17

一、引言

众所周知,税收政策是政府重要的调控工具,政府使用各种税收措施以影响微观经济主体的税负,进而作用于社会经济各领域。显而易见,税收政策调控目标达成的首要条件是纳税人能够准确感知其税收负担,这也是标准经济学模型所默认的潜在前提。但是,现实中的纳税人真的能够准确感知其税收负担吗?尤其是对缺乏财税专业知识的自然人作为纳税主体时的个人所得税(以下简称“个税”)?如果纳税人并不能准确认知自身税负,即其主观感知的税负与客观的真实税负存在差异,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有限理性、自然人课税与税收政策效应扭曲研究”(20BJY226)。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建议,文责自负。李文电子邮箱:wenlee2006@126.com。

则税收政策的效应就会发生扭曲,因为左右纳税人行为的只能是其主观感知税负,而不是税收政策实际施加的真实税负。因而,研究纳税人对税负的主观感知状况,明确其感知税负与真实税负之间的差异及其成因,对于制定适当的税收政策,保证决策者的主观意图得到顺利贯彻具有重要的意义。毕竟,如果不清楚人们的税收意识,我们怎么能知道税负的变动如何影响他们的行为(Enrick, 1963)?

20世纪60年代,Enrick(1963, 1964)、Gensemer等(1965)、Van Wagsaff(1965)开始关注个税纳税人对自身税负的正确感知问题,发现大量纳税人对税负存在错觉。随后,来自不同国家的许多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结论。但目前该领域的研究仍存在如下问题:一是现有文献对存在个税感知税负偏差的纳税人比例及感知税负偏差的具体倾向观点各异;二是现有文献对纳税人感知税负偏差的影响因素众说纷纭,尚无定论。究其原因,可能是不同文献的研究样本来自不同的国家、特征不同的群体,基于不同的税收制度,从而个税感知税负偏差的具体情况及其成因呈现不同的状况。这说明国外的研究成果很难被照搬到国情迥异的我国。但是,目前我国的文献还较少涉及个税感知税负偏差问题。虽然已有研究提及我国的微观住户调查数据中,由个人自报的个税数据存在严重缺失和错报(徐建炜等, 2013;岳希明、徐静, 2012),但尚未有文献对此进行较为系统细致的定量测算和成因分析,这个空白亟待弥补。本文利用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微观数据(甘犁等, 2013),对我国工薪阶层纳税人的工资薪金所得税(以下简称“工薪所得税”)税负感知状况进行定量评估和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将我国工薪阶层个税纳税人的税负无知和感知税负偏差问题纳入研究范畴,并从个体有限理性视角,利用行为经济学和社会心理学相关理论对其成因进行系统分析,这是已有文献尚未涉及的领域。(2)采取多种措施,最大程度保证研究结果的准确。一方面,选择数据库中“最主要的一份工作”的性质是“受雇于他人或单位(签订正规劳动合同)”的受访者作为研究样本,以确保样本的个税感知为其本人对自身个税状况的感知(而非其他家庭成员对本人个税状况的感知),同时此类性质的工作在工作时间、社会保险缴纳等方面也更加规范,有利于提高定量测算的准确性;另一方面,在测算工薪所得税真实税负时将养老、医疗、失业保险、住房公积金(以下简称“三险一金”)以及个人每年的实际工作时间、实际工作时间中的零头月份等因素均考虑在内,以避免不考虑“三险一金”、将每年工作时间直接认定为12个月等与现实状况不符的粗略测算所导致的误差。(3)证实了样本确实存在较严重的工薪所得税税负无知和感知税负偏差,而在感知税负偏差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中,揭示了一些值得关注之处,如税后收入的增长会同时显著提高税负的低估和高估倾向、自认对财经信息更关注者更容易高估税负、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会显著强化税负低估倾向等反直觉现象,还发现影响因素在不同收入水平群体之间、女性和男性之间均存在较明显差异。本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现有文献的研究缺失,对于明确我国工薪阶层纳税群体个税税负的感知状况及其成因具有重要意义,并能够为相关税收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主要针对工薪所得税的税负感知偏差,其结论并不适用于包括劳务报酬、经营所得税在内的其他个人所得税类别。

二、文献回顾

如前所述,20世纪60年代Enrick(1963, 1964)、Gensemer等(1965)、Van Wagstaff(1965)发现纳税人对个税税负的错觉普遍存在,随后,大量针对不同国籍、不同特征对象的研究得出了类似结论(Ballard和Gupta, 2018; Blaufus等, 2015, 2022; Gideon, 2017; Hundsdoerfer和Sichtmann, 2009; Lewis, 1978; Rees-Jones和Taubinsky, 2020; Rupert和Fischer, 1995; Williamson, 1976)。但对于纳税

人个税感知税负偏差的具体状况,不同文献的结论则存在较大差异。Enrick(1963,1964)发现,受访者中仅有不到5%能够正确认知自身缴纳的个税税额,而低估税额者接近40%,高估税额者超过55%;Van Wagstaff(1965)发现,在代扣代缴状态下,只有12.6%的受访者正确估计了自身个税税额,其余42.9%、44.5%的受访者则分别出现了低估和高估;Blaufus等(2015)的研究显示,大约只有1/3的受访者能够准确估计其平均税率;Ballard和Gupta(2018)则指出,有84.9%的受访者高估了自身的平均税率,且高估幅度很大,与Williamson(1976)的结论类似;Gideon(2017)也发现受访者对于平均税率存在系统高估。简而言之,相关文献在认同大多数纳税人不清楚其自身个税税负的同时,对于感知税负偏差的方向——高估还是低估,以及高估和低估的个体比重存在不同观点。

目前,国内尚缺乏对纳税人个税感知税负偏差程度的研究,但部分文献对个人税负感知问题有所涉及。刘怡和聂海峰(2005)发现,2002年广东省城镇住户调查数据中的个税数据存在大量缺失;岳希明和徐静(2012)对国家统计局2002年、2007年城镇居民住户调查数据评估后指出,该数据中由住户自报的个税信息严重低估了城镇居民的实际税收负担,进而实际低估了平均有效税率,究其原因,是调查数据中的个税信息存在漏报和低报问题;徐建炜等(2013)也指出,国家统计局在1997—2009年城镇居民住户调查数据中的个税数据缺失严重,且住户自报数据与按照个税税率表计算的应纳税额偏差巨大。由于上述文献并非以个人税负感知为研究主题,因此并未对数据库所反映的个人税负无知及感知偏差状况进行细致的分析和估算。此外,还有文献从“税感”视角讨论了纳税人的主观因素对其税负感受的影响(樊丽明、张晓雯,2013;张磊,2014)。

对于个税税负感知的影响因素,现有文献的研究主要涉及纳税人的个体特征和税制特点两个方面。其中,前者包括个人收入、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教育程度、税收和财务知识掌握状况、对公平的看法以及是否承担非税缴款等,后者则涉及税收凸显性、税制复杂性等,但是不同研究的结论也存在较大差异。

对于纳税人个体特征对个税税负感知影响的观点如下。就个人收入的影响而言,Rees-Jones和Taubinsky(2020)、Van Wagstaff(1965)认为高收入者倾向于低估其所得税,而低收入者则倾向于高估其所得税;Ballard和Gupta(2018)发现收入越高对平均税率的高估程度越低;Rupert和Fischer(1995)也指出高收入者对税率的估计会更加准确;Blaufus等(2015)发现收入对平均税率的影响不显著,但会显著导致边际税率低估。就年龄的影响而言,多数研究显示年龄对个税税负的正确感知具有显著的正面效应(Ballard和Gupta,2018;Gideon,2017),但Blaufus等(2015)发现年龄对平均税率感知的影响不显著,但会显著导致边际税率高估。就性别的影响而言,Blaufus等(2015)发现男性更容易高估平均税率;但Ballard和Gupta(2018)则认为性别对感知税率偏差的影响不显著。就受教育程度而言,König等(1995)认为学校教育是正确感知个税税负的主要决定因素;Blaufus等(2015)、Gensemer等(1965)也发现受教育程度对个税税负感知具有积极影响。但是,Ballard和Gupta(2018)的研究却显示受教育程度对感知税负偏差的影响不显著。Rupert和Fischer(1995)指出对税负感知真正起作用的是更多的财务和税收知识。因而,即使是具有较高受教育水平的内科医生群体,大多数也错误估计了自己的所得税税率(Hundsdoerfer和Sichtmann,2009)。就个人对公平的看法而言, Van Wagstaff(1965)指出,认为所得税公平的人比认为所得税不公平的人税收意识更好,Ballard和Gupta(2018)也发现个人认为自身税负过重的程度越高、税款花费越无效对平均税率的高估幅度越大。此外,Ballard和Gupta(2018)发现已婚者对平均税率的高估幅度更大;Blaufus等(2015)发现自雇者与非自雇者在税负感知方面没有显著差异;Van Wagstaff(1965)指出,与个税一同从工资中扣缴的养老、医疗保险等费用可能是导致个人错误估计所得税额的原因之一;

Blaufus等(2015)也发现没有区分社会保险税和个税者更易高估所得税平均税率。

现有研究对于税制特点对个税税负感知的影响观点较一致,一般认为税制复杂性的提高和凸显性的降低将导致更严重的税负感知偏差(童锦治、周竺竺,2011;Feldman等,2016;Schenk,2011)。

由此可见,大量文献证实确实存在较为广泛的纳税人对个税税负的感知问题,也对其成因进行了一些分析,但对个税感知税负偏差的具体表现和成因存在不同甚至相反的观点,且尚缺乏针对我国个税纳税人感知税负偏差的细致分析。

三、工薪所得税感知税负偏差测算

(一)数据来源及样本筛选

本文使用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库,由于数据库中关于“去年”,即2016年的数据较为完备,因此,本文采用2016年的数据。^①数据库报告了每个家庭受访者提供的各家庭成员在2016年全年所从事的每份工作实际获得的税后货币工资、税后奖金和税后补贴或实物收入等工薪收入,^②以及因这些收入所缴纳的个税税额。本文根据报告收入测算真实税负,并与报告税负(即感知税负)相比较,评估个人的感知税负偏差,同时也根据数据库的数据评估税负无知状况。

基于研究目的,本文对样本进行了必要筛选,仅保留了“最主要的一份工作”的性质是“受雇于他人或单位(签订正规劳动合同)”的受访者样本,且仅测算其“最主要的一份工作”的个税偏差。之所以如此限定,原因如下。首先,该数据库的数据来自对每个家庭中的受访者的询问,即除受访者外,其他家庭成员的信息并非由本人提供。由于本文评估的是个税纳税人对自身税负的感知偏差,因此,仅保留受访者样本,而将非受访者排除。其次,数据库中样本的工作类型较多,除受雇于他人或单位(签订正规劳动合同)之外,还有临时性工作(没有签订正规劳动合同,如打零工),务农,经营个体或私营企业、自主创业、开网店,自由职业以及其他(志愿者)等,这些类型的工作在个税税负测算时可能存在如下问题。一是通过这些工作获得的收入种类不同,对应的个税课税规则也不同,且有些收入从个税视角无法准确确定其收入性质。二是有些临时性工作的工作时间在一年中的分布可能非常不均匀,以数据库中报告的年收入估算个税税额会出现较大偏差。三是部分种类工作在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方面可能并不规范,难以准确评估其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这些问题都会影响个税的准确估算,所以仅保留工作性质为受雇于他人或单位(签订正规劳动合同)的受访者。最后,有些样本从事不止一份工作,而其第一份工作之外的其他工作也存在上述问题,因此,仅针对样本“最主要的一份工作”估算个税会更加准确。简而言之,这样的处理能够保证所选样本的收入为工薪收入,工作时间相对稳定,且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缴纳较规范,从而有利于较准确地测算其真实税负;同时,由于数据库中的感知税额系本人提供,因而可以评估其自身感知税负与真实税负之间的偏差,并据此实施成因分析。

(二)工薪所得税真实税负测算^③

本文通过如下步骤对2016年受访者“最主要的一份工作”的真实税额进行测算:(1)税前月平

^① 之所以未使用2019年的数据库,是因为2019年数据库反映的主要是2018年数据,而2018年10月1日起我国个人所得税工资薪金所得的标准费用扣除额从3500元提高到5000元,这一改变可能会影响纳税人对税负的正确感知,从而使该年度的情况不具有一般性。

^② 根据数据库的说明,这些税后收入是扣除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和个税之后的收入。

^③ 测算过程见线上附录。

均工薪收入计算公式推导;(2)“三险一金”缴存比例估计;(3)个税适用边际税率和速算扣除数估计。最终得到2016年全年的真实税额 $yrtax$ 和真实平均税率 $arrate$ 。

(三)感知税负偏差计算^①

根据测算出的真实税负计算得到感知平均税率偏差 $ratebias$ 和税负差异程度 $perbias$ 。其中, $ratebias$ 表示个体对自身平均税率的感知错误。其值本应等于感知平均税率 $arate$ 与真实平均税率 $arrate$ 的差额,但基于不能对个体感知税负的正确性过度苛刻,以及须容纳一定估算误差的考虑,本文将视同正确的平均税率差异设定为税负差异程度 $perbias$ 在 $\pm 25\%$ 之间。^②具体设定方式是,当平均税率差异的绝对值在真实平均税率($arrate$)的 25% 之内时, $ratebias$ 等于 0 ;当平均税率差异大于真实平均税率 $arrate$ 的 25% 时, $ratebias$ 等于平均税率差异减除 $0.25arrate$;当平均税率差异小于 $-25\%arrate$ 时, $ratebias$ 等于平均税率差异加上 $0.25arrate$ 。如此设定可以保证只将税负差异程度 $perbias$ 超过 $\pm 25\%$ 的部分视为感知税负偏差。

四、样本基本特征及工薪所得税税负感知状况分析

(一)样本基本特征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受雇于他人或单位(签订正规劳动合同)的受访者,剔除没有“三险一金”、工薪收入为 0 等不符合情理的异常值,共计 6912 个样本。这些样本的年龄、学历、“三险一金”缴存情况、月平均税前工薪收入、最高边际税率等见线上附录。

(二)工薪所得税税负感知状况分析

样本无法正确感知个税税负的情况分为两类,第一类是自行报告不知道个人的确切税额,即税负无知;第二类则是自认为知道自己的确切税额,但其主观感知税负与真实税负存在明显偏差,即出现感知税负偏差。

1. 样本税负无知状况

就总体而言,全部 6912 个样本中,感知税额为缺失值者有 1877 个,其中除少量拒绝回答者外,绝大多数(1851 人)自报不知道自己缴纳的确切税额,^③占全部样本的 26.78% ,数量可观。作为对比,不知道自己税后工资、税后奖金、税后补贴或实物收入者分别为 109 人、 166 人和 215 人,分别仅占全部样本的 1.58% 、 2.40% 和 3.11% 。^④由此可见,税负无知者占比不容忽视,且相对各类收入无知者而言数量巨大。

就不同收入水平样本而言,首先,税负无知者的月平均税前工薪收入均值为 9057.22 元,而非

^① 测算过程见线上附录。

^② 由于本文的研究目的是证实确实存在工薪所得税感知税负偏差,因此,对于税负的感知错误设定了一个较为宽松的标准,以提高结论的可信性。这个设定确实带有较高的主观性,因而本文对此进行了必要审视。首先,当将 $perbias$ 位于 $\pm 25\%$ 之间视同平均税率感知正确时,发生感知平均税率偏差的样本为 2219 人,而若将 $perbias$ 位于 $\pm 15\%$ 、 $\pm 20\%$ 、 $\pm 30\%$ 之间视同平均税率感知正确,则发生感知平均税率偏差的样本分别为 2319 人、 2262 人和 2170 人,与 2219 人的差异仅分别为 100 人、 43 人和 49 人,与平均税率偏差 $ratebias$ 非缺失值样本总数 4818 人相比,数量很小,说明本文的设定不会导致过大偏差;其次,在对感知税负偏差的成因进行实证分析时,本文使用其他视同平均税率感知正确范围进行了稳健性检验,表明无论使用哪种标准,回归结果都基本相同。

^③ 调查问卷首先询问受访者个人所得税总共支付了多少元,若受访者不知道或不愿意回答,则继续询问其支付个人所得税的数额范围,如 0.5 万元以下、 0.5 万~ 1 万元、 1 万~ 2 万元等。根据数据库数据,不知道自身税额为多少元者共 1851 人,其中 1282 人明确了税额范围,其余样本仍未明确税额范围。由于问卷中设定的税额范围相当宽泛,因此本文将所有不知道自身确切税额者均视同税负无知者。

^④ 见线上附录附图 1。

税负无知者的该指标为 6277.18 元,经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这两个均值在 1% 的水平下显著不同。由于非税负无知者的月平均税前收入^①均值仅为税负无知者的 69.31%,因而税负无知者的收入相对较高。其次,将应纳税所得额大于 0 的样本依据水平高低平均分为 4 等份,与应纳税所得额为 0 的样本一起构成 5 组。^②可以看出,应纳税所得额为 0 的样本中,税负无知者比重最低,仅为 11.37%,说明不缴税者较少对自身纳税状况产生误解;随着应纳税所得额的提高,税负无知者的比重也逐步提高,应纳税所得额次高组(第 4 组)为 41.52%,达到最高值,应纳税所得额最高组(第 5 组)税负无知者比重有少许下降。这些比重在 1% 的水平下显著不同。

就不同受教育程度样本而言,未上过学组和小学组税负无知者比重最低,随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税负无知者的比重也不断提高,在硕士组达到最高值 41.87%,博士组小幅下降为 37.50%,^③这些比重在 1% 的水平下显著不同。由此可以粗略看出,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似乎并不能改善个人对自身税负的认知。

就性别而言,税负无知者在女性中的比重为 25.32%,在男性中的比重为 27.96%,男性稍高于女性,两个比重的差异在 10% 的水平下显著,可见女性的税负无知状况稍好于男性;就年龄而言,税负无知者在 30 岁以下组中的比重为 33.10%,在 30~50 岁组中的比重为 27.38%,在 50 岁以上组中的比重为 21.98%,这些比重的差异在 1% 的水平下显著,可以看出,税负无知者比重随年龄增长而下降。

2. 样本感知税负偏差状况

现有文献对感知税负偏差的分析主要分为两种:感知平均税率偏差和感知边际税率偏差,囿于数据可得性,本文讨论的是感知平均税率偏差,为方便起见,以下简称“感知税率偏差”。

数据库共有 5035 个样本报告了自身个税税额,但由于其中的 217 人存在某些变量缺失,无法测算其所负担的真实平均税率。因此,本文能够测算感知税率偏差的样本为 4818 人。鉴于能够测算感知税率偏差者占有感知税额者的 95.69%,因此基本能够反映样本的整体状况。

首先,感知税率偏差 $ratebias$ 均值为 -0.19%,即平均偏差取向为轻微低估;最大值为 44.28%,最小值为 -25.03%,即分别将自身平均税率高估了 44.28 个百分点和低估了 25.03 个百分点。其次,高估平均税率样本占比为 12.93%,低估平均税率样本占比为 33.13%,低估样本数量明显高于高估样本数量;但高估样本感知税率偏差均值为 3.86%,高于低估样本低估平均税率的绝对值 2.07%,说明高估者的平均高估幅度大于低估者的平均低估幅度。最后,感知税率偏差绝对值畸高的样本较少,97.61% 的样本其偏差在 $\pm 10\%$ 以内,偏差为 0(即无偏差)者相对较多,感知税率偏差核密度图也证明了这一点。^④

五、个人所得税感知税负偏差的产生机理及影响因素分析

图 1 对个税感知税负偏差的产生机理进行了总体性描述。首先,个体会评估理性地正确认知个税税负的收益和成本,根据收益与成本的比较,在个税税负的理性判断与非理性判断之间进行选择,进而达成对其自身个税税负的主观感知。当理性认知税负的收益小于成本时,对税负的理性判断就成为个体的选择。由于非理性判断总是与偏差相关,因而其必然导致个体的感知税负偏离实际税负,从而产生个税感知税负偏差。其次,纳税人个体特征和税制特点通过对其规划收

① 此处的收入指工薪收入。由于本文分析的都是工薪收入,为简便起见,有时简称为“收入”。

② 每一组中税负无知者所占比重见线上附录附图 2(a)。

③ 见线上附录附图 2(b)。

④ 见线上附录附表 1 以及附图 3。

支缓解预算紧张需求等的作用影响税负理性认知收益;通过对税收专业知识等的作用影响税负理性认知成本。最后,当纳税人选择非理性判断后,其个体特征和税制特点也会作用于代表性启发式等各类不同的非理性判断方式,进而影响对税负的感知。下文对此进行详细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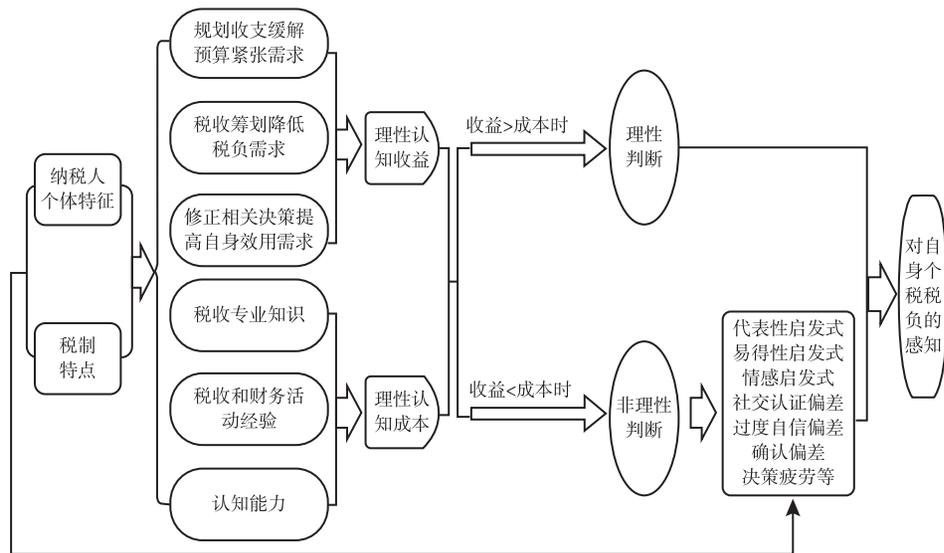


图1 个税感知税负偏差的产生机理

(一)个人所得税感知税负偏差的产生机理分析

1. 个人所得税税负理性判断与非理性判断的选择

所谓理性判断,指个体通过对相关信息的收集和计算处理,基于全面确凿的客观现实做出正确判断。但是,与简化的标准经济学模型不同,现实中的个体是有限理性的(Simon, 1955, 1956),接收、处理和记忆的信息量相当有限(Miller, 1956),因此收集和计算处理信息是有成本的,且即使付出相当的成本,也很难实现最优决策。为了规避这种成本,个体在判断和决策时,常常会选择不理性疏忽(rational inattentiveness),仅使用有限的信息和经验,基于直觉推断而非精确计算以得出结论,这种直觉推断就是启发式(heuristic)(Tversky和Kahneman, 1974)。启发式是个体实施判断的一种捷径,有多种表现形式,是典型的非理性判断方式,其简化了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能够以低成本实现快速决策,但启发式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一定的判断偏差。

Kahneman(2011)将个体的思维活动分为系统1和系统2,分别产生快思考——直觉思考和慢思考——严谨思考,因而虽然现实世界中启发式等非理性判断比比皆是,但较理性的深思熟虑也同时存在。个体对理性判断^①和非理性判断的选择依赖于对二者净收益的比较。理性判断的认知成本较高,但是偏差很小,有利于个体准确认知现实并实施正确决策进而获得相应收益;非理性判断则恰恰相反,其认知成本较低,但偏差较大,可能因此导致各类判断错误进而降低收益。在个税税负认知方面,纳税人准确知晓其税负需要关注自身的税收信息,若要对税负具有更为深刻的认识还需要对相关税收知识有较深入的了解,这都会导致认知成本的产生;而纳税人准确知晓甚至较深刻认识其税负可能带来的收益则是对税负的正确认知所促成的税额节约或相关决策收益。若理性判断所带

^① 由于个体是有限理性的,因而绝对的理性判断很难在现实中实现。本文所谓的“理性判断”是指相对于启发式等非理性判断而言,基于更全面准确的信息和较精确计算的严谨判断。

来的收益不足以弥补认知成本,纳税人就会倾向于采取非理性判断,而放弃对税负的理性认知。

个税税负理性认知成本的大小与个体特征和税制特点密切相关。若个体具有较扎实的税收专业知识、较丰富的税收和财务活动经验、较高的认知能力,则其对税负实施理性判断的认知成本就较低,反之则会有较高的认知成本;若一国的个税税制较为复杂,也会增加个体对个税税负的理性认知成本。就个税税负理性判断所带来的收益而言,若对税负的正确认知能够促使个体通过优化税收筹划策略更多地降低税负、通过对个人和家庭收支的适当规划更好地缓解预算紧张、通过更为正确的劳动供给等决策更多地提高自身效用,则其收益更高,反之则收益较低。由此可见,个税税负理性认知成本和收益的高低是因人而异和依税制特点而变,进而处于不同税制环境中的不同个体对理性判断和非理性判断的偏好也存在差异。

2. 非理性判断对个人所得税税负感知的影响

个税感知税负偏差源于个体对自身税负的的非理性判断,而非理性判断主要通过如下因素导致个税感知税负偏差。(1)代表性启发式(representativeness heuristic)。代表性启发式和下文的易得性启发式都是Tversky和Kahneman(1974)建立的,代表性启发式是指人们往往选择信息中具有代表性的特征来进行预测,而很少关注这种预测的精确性如何。在代表性启发式下,个体会根据事件与特定原型或刻板印象的匹配程度做出判断。如在认知自身的个税税负时,可能会片面关注社会保险等费用从工资中扣缴的特征,简单地将所有扣缴款都视为同样从工资中扣缴的个税;片面关注边际税率的性质而将其与平均税率混淆等,从而错误判断自身承担的个税税负。(2)易得性启发式(availability heuristic)。易得性启发式是指人们会依据与某个事件相关的事例在脑海中检索到的难易程度来实施判断,即更关注容易想起的事例。在个税税负认知方面,个体可能会依据媒体报道频率较高因而容易记起的观点、令个人印象深刻的以往涉税经验等判断自身税负,从而导致偏差。(3)情感启发式(affect heuristic)。情感启发式由Slovic等(2007)率先提出,指个体做出判断和决策时,会依赖其情绪,而不是对现有信息进行彻底分析。换言之,快乐、悲伤、沮丧、气愤等或积极或消极的情绪会影响个体的判断,如若个体处于积极情绪之中,其对税负的看法就很可能与处于消极情绪中时不同。这也会导致个体感知税负偏离实际税负。(4)社交认证偏差(social proof bias)。社交认证偏差是指存在不确定性时,个体倾向于依赖他人的行为、选择或意见作为自己判断或决策的指南,认为采取某种行动的人越多,这种行动就越正确(Cialdini, 2007),即出现“从众效应”或“羊群效应”。在个税税负认知方面,个体对自身税负的判断可能会受媒体、社交圈子中主流意见的影响,从而导致感知税负偏差的产生。(5)过度自信偏差(overconfidence bias)。过度自信偏差指个体对自身的能力、知识及对未来的预测等有超出实际的过度信心(Barber和Odean, 2001)。在个税税负认知方面,个体可能会高估自身对税收、财务相关知识的正确掌握程度,进而忽视客观信息,在估计税负时出现偏差。(6)确认偏差(confirmation bias)。确认偏差指个体倾向于以片面确认其先前存在的信念、期望或假设的方式寻找和解释信息,忽略与其信念或假设不符的证据(Nickerson, 1998),即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事情。在个税税负感知方面,不同个体对于税负的高低、公平与否等往往持有一定的既有观点,确认偏差的存在使得其在评估自身税负时,选择性地关注能够支持其既有观点的信息,而过滤和淡化与其既有观点矛盾的信息,从而产生感知税负偏差。(7)决策疲劳(decision fatigue)。决策疲劳指由于决策会耗费用于自我控制和积极反应的稀缺资源,长时间的决策会导致自我控制能力下降(包括体力下降、更多的拖延、计算质量下降等),损害个体判断的准确性(Hirshleifer等, 2019; Vohs等, 2008)。在个税税负感知方面,如果个体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需要做出多项决策,则可能产生决策疲劳,从而缺乏足够精力和意愿去关注自身准确的税负,导致感知税负偏差。

(二)个人所得税感知税负偏差的影响因素分析

如前所述,纳税人个体特征和税制特点不仅会导致个税税负理性认知收益和成本的差异,影响个体在税负理性判断和非理性判断之间的选择,在个体对税负进行非理性判断时,还会对各类启发式和认知偏差的形成构成影响,从而最终作用于个税感知税负偏差。因此,个税感知税负偏差的最终影响因素为纳税人个体特征和税制特点。与个税感知税负偏差相关的纳税人个体特征和税制特点主要包括如下方面。

1. 个人收入

个人收入对个税税负感知的影响存在不同途径。首先,由于个税往往实行超额累进税率,高收入者因高边际税率而面临较高的税收成本,因此实施税收筹划可能会获得更多的比较收益(Blaufus等,2015)。这可能导致高收入者有更强的动机关注自身税负,对税负实施理性判断,从而不易产生感知税负偏差。其次,较高的个人收入一般会使预算更加宽裕,因而高收入者为合理安排个人或家庭预算而精打细算的需求较低。换言之,关注作为一项支出的个税税负所获得的比较收益较低。这可能使得高收入者倾向于对税负实施更方便的非理性判断,进而带来感知税负偏差,而收入较低者则恰恰相反。再次,低收入者由于面临较为紧张的预算约束,可能对个税更加厌恶,基于情感启发式,其往往具有高估自身税负的倾向。最后,相对收入较低者,收入较高者面临的税率级次可能更复杂,更不易准确感知,因而收入较高者可能更易产生感知税负偏差。由此可见,个人收入对个税感知税负偏差的影响相当复杂,并不确定。

2. 年龄

首先,年长者可能在纳税方面具有更多的知识和经验,因而年龄越大,个税感知税负就越准确(Gideon,2017)。其次,就我国而言,年长者较年轻人在财务观念上往往更加保守和节约,从而明了个人的税负可能会为其带来更高的主观收益,因此年长者可能更有意愿理性关注自身税负,进而避免感知税负偏差。但是,也正因为年长者更加节约,其可能会对税收更加厌恶,基于情感启发式,也可能更倾向于高估税负。

3. 性别

女性与男性在生理上具有不同特点,社交人群存在差异,在家庭中也往往承担不同角色,因此在个税税负确认方面可能会有不同的取向。一般而言,女性行事更加谨慎和仔细,常常负责家庭财务管理的任务,更加重视预算,因而其对个税税负可能较男性更加敏感,对税负的态度更加理性;同时,在财务领域,男性较女性更加过度自信(Barber和Odean,2001)。因而,女性的感知税负可能更准确。但是,基于情感启发式,更加感性的女性也可能更容易产生偏差。

4. 受教育程度

受教育程度可能从多方面影响个税感知税负偏差。首先,受教育程度较高者具有更多的知识、更高的认知水平,因而其感知税负的成本更低,更倾向于理性判断自身税负;而受教育程度较低者则恰恰相反,可能更容易使用代表性及易得性启发式等非理性判断方式,更容易受社交认证偏差和确认偏差的影响,从而产生感知税负偏差。其次,受教育程度并不等同于税收专业知识,对税负感知起积极作用的是税收知识,而不是受教育程度,因而受教育程度较高并不见得对自身税负具有良好认知(Hundsdoerfer和Sichtmann,2009;Rupert和Fischer,1995)。再次,与受教育程度较低者相比,受教育程度较高者从事的日常工作往往涉及更多的决策,这可能会导致决策疲劳,使得受教育程度较高者相对而言更加缺乏意愿和精力去认知自身的准确税负。最后,受教育程度较高者可能会因较好的成功经历、较高的社会认可等导致过度自信,从而错误感知自身税负。

5. 婚姻状况

单身者与已婚者面对不同的财务状况,可能对预算的关注程度不同,从而对作为预算支出的个税敏感度不同。一方面,单身者仅需应对自身支出,而已婚者的收入则须用于整个家庭,因此已婚者对预算更加关注,进而可能较单身者更加了解自身税负;另一方面,对预算更加敏感的已婚者也可能因更加厌恶税负而倾向于高估税负。

6. 社会保险等缴款

一方面,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缴款及其他在工资中扣除的款项与个税一起实行源泉扣缴,因此纳税人可能会基于代表性启发式将这些缴款混淆为个税,从而导致个税感知税负偏差,且这种偏差倾向于不低估甚至高估税负(Blaufus等,2015;Van Wagstaff,1965);另一方面,社会保险缴款等是为纳税人提供了一种物质保障,相当于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其收入,因而也会降低纳税人平衡预算的需求,导致其更倾向于对税负的启发式判断,进而发生税负高估或低估。

7. 税收和财务知识

具有相应的税收和财务知识无疑会降低个体正确认知自身个税税负的成本,因而有助于正确感知税负。但如果是否拥有税收和财务知识不是由客观依据(如大学所学专业等)所衡量,而是来自个体的自我评估,则这种评估可能并不准确,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过度自信偏差的一种体现,从而导致自认为具有税收、财务知识者反而更容易出现感知税负偏差。

8. 主观感受状况

此处的主观感受状况包括对公平的看法、对政府的信任状况、对公共品供给的满意程度、对自身现状的看法等,可能也会影响个体的税负感知。首先,如果个体认为税负较公平、公共品供给效率较高、政府值得信任、自身生活状况较顺利,其一方面会觉得支付的税价得到了必要回报,从而降低对税收的排斥;另一方面则处于较积极的情绪中,基于情感启发式,一般不倾向于高估个税税负。反之,当个体认为税收并未带来应得的回报,处于较为消极的情绪中时,可能就会更加厌恶税收,从而倾向于高估自身税负。其次,如果个体具有税负不公、公共品供给效率低、政府不值得信任等既有观念,由于确认偏差,其可能会仅片面关注能证实其观点的信息,而忽略与其观点相悖的信息,从而加重对税收的负面观感,最终高估自身税负,反之亦然。

9. 税制状况

税制状况主要包括税制的复杂性和凸显性(salience)。税制越复杂、越不透明、凸显性越低,个体掌握税法的成本就越高,则其更倾向于选择理性疏忽,仅根据不完全信息实施非理性判断,进而导致感知税负偏差。前述更多的税率累进级次对较高收入者税负认知的影响其实也是税制状况影响的体现。

总之,可能影响个税感知税负偏差的因素众多,影响途径复杂,且对特征不同个体的作用情况存在差异,因此各因素的最终作用结果仅根据定性分析难以明确,还须通过定量分析加以检验。

六、工薪所得税感知税负偏差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 变量设定及描述性统计^①

1. 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感知税负偏差倾向(*mbias*),低估、正确估计、高估税负分别取值为1、2、3,同时

^① 变量定义表见线上附录附表2。

在实施稳健性检验时使用感知税负错误虚拟变量(*bbias*)作为被解释变量,税负估计错误取值为1,正确取值为0。

2. 解释变量

(1)2016年税后工薪收入的自然对数(*lnsalary*)。其取值为 $\ln(\text{年税后货币工资}+\text{年税后奖金}+\text{年税后补贴或实物收入})$ 。之所以使用年税后收入,一是由于税后收入为扣除了个税和“三险一金”之后的净收入,是样本能够直接支配的收入,较税前收入而言,其对样本财务状况的影响更直接,同时对“三险一金”的扣除也有利于独立分析“三险一金”对感知税负偏差的影响;二是由于部分样本一年的工作时间不到12个月,因而年收入较月收入而言,对样本财务状况的反映更加准确。(2)样本的年龄(*age*)。取值为2017-出生年份。(3)性别(*gender*)。女性取值为1,男性取值为0。(4)受教育程度(*edu*)。最高学历为未上过学至博士依次取值1~8。(5)婚姻状况(*marr*)。考虑到有家庭与无家庭对个税税负感知偏差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因此,将已婚、同居、再婚等有家庭者取值为1,其他取值为0。(6)“三险一金”缴存比例(*per*)。其取值的测算见前文。(7)对财经信息是否关注(*ecoinf*)。来源于对问卷问题“您平时对经济、金融方面的信息关注程度如何?”和“您关注财经类新闻的途径是什么?”的回答,将从不关注取值为0,其他取值为1。(8)对4个相关主观感受状况变量进行因子分析得到的因子分(*f1*)。一是自感幸福度(*happy*),来自对问卷问题“总的来说,您是否觉得幸福?”的回答,从非常不幸福到非常幸福分别取值为1~5;二是公共服务提供满意度(*pubsatisfy*),来自对问卷问题“您对当地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整体满意度如何?”的回答,从非常不满意至非常满意分为11个级别,分别取值为0~10;三是公共服务改善满意度(*pubimpr*),来自对问卷问题“与5年前相比,您对当地在改善基本公共服务方面所取得的进展满意度如何?”的回答,从非常不满意到非常满意分别取值为1~5;四是公共服务公平意识(*pubfair*),来自对问卷问题“如果您知道您与全国各地的居民交纳同样数额的税收,但是享受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却相对较差一些,您是否愿意交同样的税款?”的回答,从非常不愿意到非常愿意分别取值为1~5,该变量越大,说明个体对税款缴纳和公共品供给的公平与否越不在意。因而*f1*从整体上反映了样本的相关主观感受状况。之所以采用因子分析法,是因为上述4个变量分别反映了主观感受的不同维度,但相互之间又存在较密切的关联,使用因子分*f1*能够较好降维又最大限度保留不同维度的信息。经检验4个变量的总体KMO值为0.6314,说明可以实施因子分析。在因子分析中,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只有一个,将其保留并生成因子分*f1*。(9)样本对政府的监督意愿(*supv*)。其来源于对问卷问题“如果赋予您对地方政府的行为进行监督的权力,您是否愿意行使这一权力?”的回答,从非常不愿意到非常愿意分别取值为1~5。该变量也能够从一个侧面反映样本主观感受状况。之所以未将其纳入前述因子分析,是因纳入后其将单独处于与其他变量不同的因子中,且KMO值较低。

由于所有的样本都处于同一个税规则下,税制的复杂程度和凸显性差异不大,因而未专门设置反映税制特点的解释变量,仅将税率累进级次不同所导致的税制复杂性差异粗略归入了不同收入的影响之中。^①

3. 控制变量

考虑到人均家庭年收入(*lnincome*)和家庭总资本(*wcapital*)可能也会影响预算状况,因此,控制了这两个变量;对于签订劳动合同的雇员而言,户口类型对个税感知税负偏差的影响不明确,但

^① 此外,样本若有其他收入来源可能也会影响其对自身工薪所得税负的准确认知。但是,首先,本文样本中明确自身拥有一份以上工作者仅占全部样本的3.78%,因而其他工作收入对样本工薪所得税负认知的影响相对较小;其次,基于数据可得性,很难准确度量非工作收入的影响。所以本文未将其他收入来源对自身工薪所得税负认知的影响纳入分析。

为了避免户口类型不同可能带来的隐性影响,控制了不同户口类型虚拟变量(*status1~3*);在研究职业对个税感知税负偏差的影响时,现有文献一般将其分为自雇者与非自雇者两类(Blaufus等, 2015),而本文的样本全部为签订了劳动合同的非自雇者,相互之间的职业差异不够明显,但为了控制不同职业可能导致的影响,同样将不同职业虚拟变量(*career1~7*)纳入模型。^①

(二)样本工薪所得税感知税负偏差倾向的影响因素分析

1. 基准模型

工薪所得税感知税负偏差倾向的影响因素分析是希望通过实证分析,检验各因素对样本高估、低估或正确估计税负的倾向的影响。被解释变量为 *mbias*,其取值规则为低估、正确估计、高估税负分别设定为 1、2、3,但这并不意味着 *mbias* 是定序变量,因为高估和低估都是出现错误,且高估和低估的原因有时可能是相同的,如出于某种原因不关注个税税负者既可能高估税负,也可能低估税负。因此,低估、正确估计、高估并没有一定的排序,而是三种不同的类型。但若将低估和高估作为估计错误的两种情形,与正确估计一起建立嵌套模型,也存在问题,因为低估和高估虽然都有偏差,但二者之间的差异有时可能会大于低估与正确估计或高估与正确估计之间的差异,所以如此设定嵌套结构并不妥当。鉴于此,基准模型采用多项 Logit 模型,以 *mbias* 为被解释变量,对前述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进行回归。本回归以正确估计税负作为参照,回归结果如表 1 所示。

(1)*lnsalary* 对于税负低估和高估都具有显著正向效应,即税后收入越高,个体越倾向于低估税负,同时也越倾向于高估税负。这种状况说明随着税后收入的增长,样本对自身税负的关注度显著降低,从而更容易发生高估或低估税负的误差。究其成因,一是税收筹划需求并未随税后收入的提高而增强,这可能与我国工薪所得税总体税负不高且相对缺乏税收筹划空间,从而实施税收筹划的比较收益较低有关;二是收入提高所带来的更高的预算宽松度可能降低了个税税负在财务方面的重要性;三是较高收入者所面临的更多的税率累进级次提高了税制的复杂性,可能干扰了其对于税负的准确认知。(2)*age* 对于税负低估和高估都具有显著负向效应,即年龄越大,越不会高估和低估自身税负,对税负的认知越准确。年长者在税收经验方面的优势及更为保守的理财观念可能是这种状况形成的原因,情感启发式所导致的税收厌恶并不显著。(3)*gender* 对于税负低估和高估都具有显著负向效应,即相对男性而言,女性既不容易高估税负,也不容易低估税负。女性更加仔细的特征、在家庭财务管理中的角色及男性更严重的过度自信偏差是可能的成因。(4)*edu* 对于税负低估有显著正向效应,对于税负高估的影响不显著,即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倾向于低估自身税负。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受教育程度较高者由于缺乏税收知识并不见得对自身税负有良好认知的观点,受教育程度较高者的决策疲劳和过度自信可能也是这种状况的成因。(5)*marr* 对于税负低估和高估均无显著效应,即是否有家庭对个税税负感知倾向没有显著影响。(6)*per* 对税负低估没有显著影响,但对税负高估具有显著正向效应,即“三险一金”缴存比例越高,越倾向于高估税负。这可能与样本基于代表性启发式将这些缴款与被源泉扣缴的个税税款相混淆有关,这个结果与 Blaufus 等(2015)、Van Wagstaff(1965)的研究结论相同。(7)*ecoinf* 对税负低估的影响不显著,但对税负高估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这并不能表明财经知识对税负感知具有负面影响,由于本文中的 *ecoinf* 来源于样本的自我评估,因而这种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反映了样本所存在的过度自信偏差。(8)*f1* 对税负低估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对税负高估的影响不显著,即样本自我感觉越幸福、对当地公共服务越满意、公共服务公平意识越弱,就越倾向于低估税负,这可能是情感启发式和确认偏差的作用。(9)*supv* 对高估和低估的影响都不显著,即监督政府意愿的强弱并不影响样本对自身税负的感知倾向。

^①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线上附录。

表1 基准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多项 Logit 回归	
	低估	高估
<i>lnsalary</i>	3.110*** (25.13)	1.982*** (14.48)
<i>age</i>	-0.017*** (-3.31)	-0.014** (-2.23)
<i>gender</i>	-0.163* (-1.74)	-0.270** (-2.42)
<i>edu</i>	0.103** (2.15)	0.089 (1.55)
<i>marr</i>	-0.129 (-0.98)	-0.034 (-0.21)
<i>per</i>	-0.729 (-0.82)	6.197*** (5.31)
<i>ecoinf</i>	-0.009 (-0.10)	0.248** (2.20)
<i>f1</i>	0.110** (2.42)	-0.084 (-1.59)
<i>supv</i>	0.009 (0.23)	0.016 (0.35)
常数项	-33.988*** (-26.34)	-24.768*** (-17.46)
控制变量	Yes	Yes
样本容量	4209	

注:括号中数据为Z值;***、**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下显著。

2. 稳健性检验^①

(1)内生性排除。用样本2014年的税后收入^②替代2016年的税后收入以消除解释变量 *lnsalary* 与被解释变量 *mbias* 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关系,回归结果在很大程度上说明研究结论可信。(2)以被解释变量 *bbias* 替代 *mbias*。以感知税负错误虚拟变量 *bbias*(税负估计错误时取值为1)替代 *mbias*,实施Logit回归,发现本模型的回归结果与基准模型存在高度的相似性。(3)变更感知税负偏差的确认标准。为了减少基准模型税负感知正确确认标准的主观性,再将税负感知正确的标准分别改为 $|perbias| \leq 20\%$ 和 $|perbias| \leq 30\%$,回归结果显示基准模型的估计结果较为可靠。

(三)调节效应检验

基准回归主要检验了各解释变量对工薪所得税感知税负偏差倾向的独立影响,但在对被解释变量的效应方面,解释变量之间是否存在交互作用也是一个相当有趣的问题。教育和收入是涉及样本个人特征的两个重要变量,因而在此分析受教育程度对税后收入影响的调节效应。不论税负低估还是高估,*lnsalary*和*edu*的主效应均显著为正,^③与基准模型结果类似,即税后收入和受教育程度越高,样本越倾向于低估和高估税负。但是,*edu*对*lnsalary*的影响存在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将削弱税后收入增长所引发的税负高估和低估倾向。此调节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受教育程度在个税税负感知方面作用的复杂性。

① 稳健性检验的详细分析见线上附录。

② 数据来源于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

③ 见线上附录附表6。

(四) 异质性分析

本部分将针对不同的收入水平和性别,对感知税负偏差倾向实施异质性分析。^①

1. 不同收入水平样本感知税负偏差影响因素分析

以税后收入的中位数为界,将样本分为高收入组和低收入组。影响因素在高收入组和低收入组之间存在较大差异。首先,两个组别之间的相同之处是,婚姻状况、监督政府意愿对感知税负偏差倾向的影响都不显著,与基准模型相同。其次,其他解释变量对感知税负偏差倾向的影响在两个组别之间均存在差异。一是低收入组的税后收入越高,就越容易高估和低估税负,与基准模型相同;而税后收入对高收入组税负低估倾向的影响不显著,却对税负高估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可能是因为其税负较高使得理性关注税负并进而实施必要筹划能够带来更多的经济利益。二是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自认对财经信息的关注对低收入组的感知税负偏差倾向具有显著影响,与基准回归类似,但对高收入组的感知税负偏差倾向则没有显著影响,说明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以及在财经知识方面的过度自信偏差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低收入群体中。三是“三险一金”缴存比例对低收入组的影响是促使其显著高估税负,而对高收入组的影响则是促使其不低估税负,这是“三险一金”与个税混淆在两个组别的不同表现。四是个体在自感幸福、公共服务满意度、公共服务公平意识等方面的主观感受状况对低收入者的感知税负偏差倾向没有显著影响,但在高收入组却会导致对税负的显著低估,说明相关的情感启发式和确认偏差主要作用于高收入者。

2. 不同性别样本感知税负偏差影响因素分析

首先,两个组别的相同之处在于,税后收入、年龄、婚姻状况、“三险一金”缴存比例、监督政府意愿对女性和男性感知税负偏差倾向的影响相同,且与基准模型结果类似。其次,两个组别的不同之处在于,受教育程度、主观感受状况仅对女性的税负低估倾向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自认对财经信息的关注则仅对男性的税负高估倾向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情感启发式对女性的影响更大,而过度自信偏差则主要作用于男性。

七、结论与建议

本文利用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对我国签订正规劳动合同雇员的工薪所得税感知税负状况进行了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首先,样本确实存在较严重的税负无知和感知税负偏差。一是税负无知者占全部样本的比重为26.78%,该比重随收入的增长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基本呈上升趋势,随年龄的增长不断下降,女性中的税负无知者比重低于男性。二是就感知税负偏差而言,错误感知平均税率的样本比重为46.06%,其中低估者比重为33.13%,远高于高估者比重12.93%;感知平均税率偏差介于-25.03%和44.28%之间,均值为-0.19%,即总体偏差倾向为轻微低估,偏差绝对值畸高的样本较少。

其次,税后收入的增长会显著提高税负低估和高估倾向,年龄增长则恰恰相反,女性较男性更不容易低估和高估税负,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及与自感幸福、公共服务满意度、公共服务公平意识等相关的主观感受状况的改善均会显著强化税负低估倾向,“三险一金”缴存比例的提高、自认对财经信息的关注则会显著提高税负高估倾向,婚姻状况和监督政府意愿对税负高估和低估倾向没有显著影响。此外,受教育程度提高将削弱税后收入增长所引发的税负高估和低估倾向。

^① 见线上附录附表7。

最后,感知税负偏差的影响因素在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之间、女性和男性之间均存在差异。对于不同收入水平组别而言,婚姻状况、监督政府意愿等变量具有类似的影响;税后收入、“三险一金”缴存比例对低收入组和高收入组均具有显著影响,但影响方式存在一定差异;而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自认对财经信息的关注等变量仅显著作用于低收入组,对高收入组没有显著影响,主观感受状况则恰恰相反,仅对高收入组具有显著效应。对于不同性别组别而言,税后收入、年龄、婚姻状况、“三险一金”缴存比例、监督政府意愿对女性和男性的影响相同,其他变量的影响在两性之间存在差异,情感启发式对女性的影响更大,而过度自信偏差主要体现在男性身上。

由此可见,工薪阶层的个税税负无知和感知税负偏差在现实中广泛存在,这种状况会严重影响纳税人对税收政策的理解,因此在税收政策制定过程中,决策者应当对税负无知和感知税负偏差的整体状况及其在不同特征群体中的表现进行评估,并明了各种影响因素的作用,从而建议做到以下方面。

首先,避免税收政策的实际效应偏离预期效应。纳税人的税负无知和感知税负偏差会影响其对税收政策的反应,使得建立在纳税人理性认知假设之上的税收政策在现实中的实际效应偏离预期效应,从而导致政策制定者的主观意图落空。因此,在税收政策制定时,应当将纳税人的税负感知状况纳入考虑范围,从而尽量保证税收政策的实际效应与预期效应吻合。

其次,利用纳税人的有限理性更好实现政策目标。一些研究显示,政策制定者可以利用纳税人有限理性所导致的税负错觉达成一定的政策目标,如在获取更高税收收入的同时,降低纳税人的税负痛感;或改变纳税人对自身税负与他人税负相对高低的看法,从而获得更好的心理感受(Blaufus等,2013)。在个税税收政策领域也可以利用纳税人整体或不同特征纳税人群体的税负无知和税负感知偏差,有针对性地设计税收措施,以更好达成政策目标。

最后,消除纳税人感知税负偏差应有的放矢。本文的分析发现,对于不同收入、不同性别的纳税人而言,其税负感知偏差的影响因素及其效应均存在差异,因此,当需要消除纳税人的感知税负偏差时,需要针对不同的人群采取不同的措施。

参考文献:

- 樊丽明、张晓雯:《从税负到“税感”:理论及实证分析》,《财贸经济》2013年第9期。
- 甘犁、尹志超、贾男、徐舒、马双:《中国家庭资产状况及住房需求分析》,《金融研究》2013年第4期。
- 刘怡、聂海峰:《中国工薪所得税有效税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
- 童锦治、周竺竺:《基于启发式认知偏向的税收显著性研究评述》,《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 徐建炜、马光荣、李实:《个人所得税改善中国收入分配了吗——基于对1997—2011年微观数据的动态评估》,《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
- 岳希明、徐静:《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居民收入分配效应》,《经济学动态》2012年第6期。
- 张磊:《我国公民纳税人税感问题研究》,《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
- Ballard, C. L., & Gupta, S., Perceptions and Realities of Average Tax Rates in the Federal Income Tax: Evidence from Michigan. *National Tax Journal*, Vol. 71, No. 2, 2018, pp. 263-294.
- Barber, B. M., & Odean, T., Boys Will Be Boys: Gender, Overconfidence, and Common Stock Investment.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16, No. 1, 2001, pp. 261-292.
- Blaufus, K., Bob, J., Hundsdoerfer, J., Kiesewetter, D., & Weimann, J., Decision Heuristics and Tax Perception—An Analysis of a Tax-Cut-Cum-Base-Broadening Policy.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Vol. 35, 2013, pp. 1-16.
- Blaufus, K., Bob, J., Hundsdoerfer, J., Sielaff, C., Kiesewetter, D., & Weimann, J., Perception of Income Tax Rates: Evidence from Germany. *European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40, No. 3, 2015, pp. 457-478.
- Blaufus, K., Chirvi, M., Huber, H., Maiterth, R., & Sureth-Sloane, C., Tax Misperception and Its Effects on Decision Making - Literature Review and Behavioral Taxpayer Response Model. *European Accounting Review*, Vol. 31, No. 1, 2022, pp. 111-144.

13. Cialdini, R. B., *Influence: The Psychology of Persuasion*.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7.
14. Enrick, N. L., A Pilot Study of Income Tax Consciousness. *National Tax Journal*, Vol. 16, No. 2, 1963, pp. 169–173.
15. Enrick, N. L., A further Study of Income Tax Consciousness. *National Tax Journal*, Vol. 17, No. 3, 1964, pp. 319–321.
16. Feldman, N. E., Katusčák, P., & Kawano, L., Taxpayer Confusion: Evidence from the Child Tax Credi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106, No. 3, 2016, pp. 807–835.
17. Gensemer, B. L., Lean, J. A., & Neenan, W. B., Awareness of Marginal Income Tax Rates among High-Income Taxpayers. *National Tax Journal*, Vol. 18, No. 3, 1965, pp. 258–267.
18. Gideon, M., Do Individuals Perceive Income Tax Rates Correctly? . *Public Finance Review*, Vol. 45, No. 1, 2017, pp. 97–117.
19. Hirshleifer, D., Levi, Y., Lourie, B., & Teoh, S. H., Decision Fatigue and Heuristic Analyst Forecast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Vol. 133, No. 1, 2019, pp. 83–98.
20. Hundsdoerfer, J., & Sichtmann, C., The Importance of Taxes in Entrepreneurial Decisions: An Analysis of Practicing Physicians' Behavior. *Review of Managerial Science*, Vol. 3, No. 1, 2009, pp. 19–40.
21. Kahneman, D., *Thinking, Fast and Slow*.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1.
22. König, H., Laisney, F., Lechner, M., & Pohlmeier, W., Tax Illusion and Labour Supply of Married Women: Evidence from German Data. *Kyklos*, Vol. 48, No. 3, 1995, pp. 347–368.
23. Lewis, A., Perceptions of Tax Rates. *British Tax Review*, Vol. 6, 1978, pp. 358–366.
24. Miller, G. A., The Magical Number Seven, Plus or Minus Two: Some Limits on Our Capacity for Processing Inform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Vol. 63, No. 2, 1956, pp. 81–97.
25. Nickerson, R. S., Confirmation Bias: A Ubiquitous Phenomenon in Many Guises.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Vol. 2, No. 2, 1998, pp. 175–220.
26. Rees-Jones, A., & Taubinsky, D., Measuring “Schmeduling”.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 87, No. 5, 2020, pp. 2399–2438.
27. Rupert, T. J., & Fischer, C. M.,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Taxpayer Awareness of Marginal Tax Rate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Taxation Association*, Vol. 17, No. 2, 1995, pp. 36–59.
28. Schenk, D. H., Exploiting the Saliency Bias in Designing Taxes. *Yale Journal on Regulation*, Vol. 28, No. 2, 2011, pp. 253–311.
29. Simon, H. A., A Behavioral Model of Rational Choic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69, No. 1, 1955, pp. 99–118.
30. Simon, H. A., Rational Choice and the Structure of the Environment. *Psychological Review*, Vol. 63, No. 2, 1956, pp. 129–138.
31. Slovic, P., Finucane, M. L., Peters, E., & MacGregor, D. G., The Affect Heuristic.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Vol. 177, 2007, pp. 1333–1352.
32. Tversky, A., & Kahneman, D., Judgement under Uncertainty: Heuristics and Biases. *Science*, Vol. 185, No. 4157, 1974, pp. 1124–1131.
33. Van Wagstaff, J., Income Tax Consciousness under Withholding.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Vol. 32, No. 1, 1965, pp. 73–80.
34. Vohs, K. D., Baumeister, R. F., Schmeichel, B. J., Twenge, J. M., Nelson, N. M., & Tice, D. M., Making Choices Impairs Subsequent Self-Control: A Limited-Resource Account of Decision Making, Self-Regulation, and Active Initiativ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94, No. 5, 2008, pp. 883–898.
35. Williamson, J. B., Beliefs about the Rich, the Poor and the Taxes They Pay.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Vol. 35, No. 1, 1976, pp. 9–30.

On Tax Burden Perception of Wage and Salary Income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Employees with Formal Labor Contracts

LI Wen (Shandong University, 250100)

Summary: Tax policy is an important regulatory tool used by governments to influence the behavior of individuals by adjusting the tax burden. A fundamental prerequisite for achieving the regulatory objectives of

tax policy is that taxpayers can accurately perceive their tax burden; otherwise, the effectiveness of tax policy may be distorted. Numerous studies from various countries have shown that a significant proportion of individual income taxpayers misperceive their tax burden. However, existing literature varies in estimates of the proportion of taxpayers experiencing perception bias and in the specific tendencies of such bias. Additionally, there is no consensus on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ax burden perception bias. In China, research on tax burden perception bias related to individual income tax remains limited. This paper aims to fill this gap by examining the wage and salary income tax burden perception in China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First, this study utilizes micro-level household survey data from China, focusing on employees with formal labor contracts as the sample. It calculates the actual tax burden of wage and salary income for the sample and measures their perception bias. Additionally, the extent of tax burden ignorance is also assessed. Second, drawing on behavioral economics and social psychology theories, the study analyzes the mechanisms and factors driving individual income tax perception bias. It argues that accurately understanding the tax burden imposes significant cognitive costs on individuals with bounded rationality. As a result, individuals may abandon rational judgment in favor of intuitive, albeit irrational decision-making, leading to cognitive bias.

The study finds that a significant proportion of the sample exhibits tax burden ignorance and perception bias. Tax burden ignorance accounts for 26.78% of the total sample, with variation based on income, education level, age, and gender. In terms of perception bias, nearly half of the sample misjudges their average tax rate, with underestimators significantly outnumbering overestimators. The overall bias trend indicates a slight underestimation of the tax burden, with relatively few cases of extreme deviations. Various factors influence an individual's tax burden perception bias. Higher after-tax income significantly raises both underestimation and overestimation tendencies, while aging has the opposite effect. Women are less likely than men to underestimate or overestimate their tax burden. Higher education levels, greater subjective well-being, satisfaction with public services, and awareness of public service fairness all significantly reinforce the tendency to underestimate the tax burden. Conversely, a higher paid-in ratio of social insurance and housing provident fund, as well as greater self-reported attention to financial information,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the tendency to overestimate tax burden. Marital status and willingness to supervise the government had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tax burden overestimation or underestimation. Additionally, higher education levels mitigate the overestimation and underestimation tendencies induced by rising after-tax income. Furthermo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ax burden perception bias differ between high-income and low-income groups, as well as between men and women.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ax burden ignorance and perception bias regarding individual income tax is widespread among China's wage-earning population. This situation significantly affects taxpayers' understanding of tax policies, potentially leading to deviations between actual policy outcomes and intended objectives. Therefore, policymakers should consider taxpayers' perception of their tax burden when formulating tax policies.

Keywords: Personal Income Tax, Perception of Tax Burden, Bounded Rationality, Heuristic

JEL: D03, H24, H31

责任编辑:馨 兰